

揭开四十年谜团  
我国首次发掘

## 北魏皇家祭天遗址

高平

一个青山上的大土包,困扰了考古人员40年。

近日,内蒙古考古研究所对外公布了这个大土包蕴含的历史文化密码——1500年前的北魏皇家祭天遗址。

据史书记载,北魏孝文帝494年迁都洛阳之前,“行幸阴山,观云川”,即来到阴山祭天观天象。

考古学家一直在寻找这个“观云川”的地方。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本次考古负责人张文平研究员认为,初步判断,孝文帝“观云川”就在这个地方。根据对出土文物的年代鉴定,初步推断这一遗址使用时间大体在公元430年至490年之间。

## 皇家祭天遗址

## 对大土包的三个猜测

北魏皇家祭天遗址,专业名为呼和浩特武川县坝顶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大青山乡坝顶村西南1公里处的蜈蚣坝顶之上。蜈蚣坝顶部山势平缓,海拔高度达1660米,遗址即坐落于这片平缓山地的中部,东侧及北侧为S104公路自呼和浩特市市区至武川县的上行路,西侧为乌素图沟,南望土默特平原。

坝顶遗址远望如一个圆形大土包,具体则由内圈、内辟雍、内外环和外辟雍由内向外构筑而成,分布范围约10000平方米。近年来,遗址附近的坝顶村村民耕种土地主要是围绕内外辟雍进行耕种,使遗址的本体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但遗址的主体形制犹存。除了位于遗址东南部分外环的墙体受到村民耕地的破坏,平面形制不可辨,其余遗迹均保存较好。

坝顶遗址在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已被发现,后来又有学者做过调查,但其性质一直存在争议。对于坝顶遗址性质的认定,主要有魏帝行宫、北魏白道城下城的烽火台等观点。201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相关业务人员,对坝顶遗址进行了详细调查,通过对遗址形制结构及遗物的综合分析,结合文献记载,初步推断该遗址为一处北魏礼制建筑遗存。

## 历时两年发掘揭开神秘面纱

张文平研究员讲述了考古发掘过程。近年来,坝顶村村民围绕遗址内外辟雍的圆圃耕种,对遗址的破坏越来越大。鉴于该遗址的重要性,需尽快明确遗址性质,在此基础上予以妥善保护,是非常必要的。2019年、2020年申报国家文物局主动性考古发掘项目,对该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工作。

坝顶遗址发掘共布置了10米乘10米



探方100个,基本对遗址实现了全覆盖。2019年度的考古发掘区选择在遗址东南部,涉及遗址的墙垣、内外辟雍和内外环。

经发掘,在内辟雍的堆积土层中,出土有陶片、残砖、板瓦、木炭等,多系北魏文物。内辟雍底部出土的动物骨骼,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动物考古学专家鉴定,种类为马、羊,个体为12匹马、2只羊,其中一只为山羊,部分动物骨骼表层或局部碳化,有火烧痕迹,周围覆盖有红烧土和碳化木头。初步推断,这些动物骨骼为祭祀用品。

2020年的发掘工作集中于墙垣内部。发现夯土墙内壁有均匀分布的壁柱,内部地面上散落大量的木构件,出土有陶器、石器、铁器等。圆形夯土墙东南方向有长约8米、宽约1米的门址。

考古人员在遗址中部发现一座皇帝

祭天的圆形房屋遗址,房址内径约15.5米,外径约32.5米,东南部留有宽约1米的门道,房址出土少量祭祀用的陶罐。在圆形房屋外圈有内外两道放羊、马等祭品的环壕,从中出土少量马和羊的肢骨等。圆形房屋外边还发现内外两个环,即皇帝祭天文武官员陪祭站立的平台。

张文平说,该遗址所在位置,北魏时期名为白道岭,白道岭之上有白道贯通阴山南北,遗址即位于白道之上。据《魏书·高祖纪》记载,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元宏北巡阴山,曾于阴山之上“观云川”,即观天象。孝文帝“观云川”之地,极有可能与该遗址有关。综合来看,该遗址为北魏时期盛乐及阴山地区一处重要的皇家祭天遗址。

## 其形制非常类似于北京天坛

张文平说,虽然史书上与北魏皇家祭天相关的记载很多,但在此次发掘之前没有发现过北魏皇家祭天遗址。此处皇家祭祀遗址在形制上结合了中原王朝祭祀礼制和北方游牧民族祭祀传统,年代上早于西安隋唐圜丘和北京明清天坛,为研究我国古代皇家祭天发展史、北魏祭天礼仪制度提供了珍贵实物证据。

张文平介绍,坝顶祭天遗址其形制非常类似于北京天坛的圜丘和西安圜丘。作为明清两代皇帝祭天祭坛的北京天坛圜丘,始建于明朝嘉靖九年(1530年),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和十八年二次改建。西安圜丘初建于隋,废弃于唐末,是隋、唐二朝皇帝进行祭天活动的礼仪建筑,位于唐长安城明德门遗址东约950米处,即今西安市雁塔区陕西师范大学以南。

“蜈蚣坝上的坝顶圜丘遗址与西安圜丘、北京天坛圜丘相比均为坛式建筑;其与西安圜丘的构筑材质相同,均为夯土筑造,而北京天坛圜丘为石筑;西安圜丘有十二陛,北京天坛圜丘有四陛,而坝顶圜丘遗址仅一陛;坝顶圜丘遗址的圆形台体周缘有土筑垣墙环绕,北京天坛圜丘的圆形台体周缘为汉白玉柱栏,而西安圜丘的圆形台体是开敞式的;北京天坛圜丘顶层中心位置放置有一块圆形天心石,西安圜丘顶层中心位置可见一个小凹坑。而坝顶圜丘遗址顶层中心现为一个盗坑,原始遗迹已不存在。”张文平解释道。

圜丘祭天为历代王朝皇家的专利,那么坝顶圜丘遗址作为北魏时期的一处遗址,与北魏王朝的皇家祭祀活动有何关联呢?如《魏书·礼志四之一》记载:太宗神瑞元年(414年),“又于云中、盛乐、金陵三所,各立太庙,四时祀官侍祀。”云中即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古城村古城,盛乐即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土城子古城,均位于今土默特平原之上,为拓跋鲜卑代国及北魏早期的行宫所在。根据史书记载,坝顶圜丘遗址应该就是附属于魏帝行宫阿计头殿的一座祭坛的遗址。

兰州文殊院:  
藏在闹市的古庙

黄建强

在兰州市城关区省政府旁边,兰州市中央广场东侧山字石街,有一座小巧玲珑的古庙,藏在闹市中心,少有人知。这座寺庙就是文殊院,是甘肃省文物保护单位。

兰州文殊院的名气度不高,就连很多居兰州的当地人,也没有留意过它,当然也就没有多少游客知道它了。实际上,如果你问兰州本地人文殊院在什么地方,很多人恐怕也会一头雾水,就算是知道这座寺庙的兰州本地人,也通常不会将这座寺庙叫做“文殊院”,而是叫做“左营庙”。

左营庙修建于明朝末年。后经清代乾隆、道光年间两次扩建,规模宏大,建筑风格独特,在历史上颇具影响力。清光绪年间,洛桑慈成喇嘛从西藏学经归来后,任该寺住持多年,从此该庙成为兰州藏传佛教寺庙。

关于左营庙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清朝末年,陕甘总督左宗棠来到金城,看到这个寺院破败,就出资重新修缮,以后人们就称之为左营庙。还有一种说法是,清朝时期,兰州信奉佛教的居民出资分别在兰州城东南西北各修建了一座庙宇,分别是左营庙(现山字石街)、右营庙(现萃英门一带)、北营庙(现永昌路一带)和南营庙(现双城门一带)。由于清代以后兰州多次遭受战争创伤,其余庙宇损毁殆尽,只剩下左营庙这一座庙宇。

左营庙变成文殊院,也有来历。据说,甘肃省佛教协会会长嘉木样活佛在藏传佛教中意为文殊菩萨的化身,左营庙后来就更为文殊院。文殊院目前是甘肃省佛教协会所在地,也是一处开放的佛教活动场所。

重建圆明园?  
国家文物局:慎重论证

韦衍行

近日,国家文物局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关于“重建圆明园,加强国家爱国主义文化建设的建议”时称,重建圆明园缺乏必要的考古及历史文献依据,且将改变圆明园遗址被列强破坏的历史现状,应慎重论证其必要性和可行性。

国家文物局表示,圆明园遗址不仅是清代皇家园林的重要代表,更是近代中国被侵略、殖民的历史见证。遗址以断壁残垣告诫后人勿忘国耻、警钟长鸣。

未来将用虚拟方式  
再现圆明园昔日盛景

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圆明园遗址的考古、保护与展示利用工作。2000年批复《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2010年将圆明园遗址列入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4年批复《圆明园遗址考古工作规划(2014—2020年度)》,“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推进大宫门、碧山书房、如园、舍卫城等遗址考古发掘,以及重要节点本体保护、遗址展示、环境整治等方面工作,有效改善了圆明园遗址的整体风貌,充分发挥了圆明园遗址的国耻纪念馆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

下一步,国家文物局将与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做好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进一步发挥教育、宣传和展示功能,不断提升圆明园的展示利用水平。同时支持北京市人民政府加强圆明园文化价值传播,采用数字化等虚拟方式再现圆明园昔日盛景,并结合考古工作开展形式多样的公众考古活动,宣传、普及圆明园遗址核心价值内涵,正确认识圆明园遗址所反映的近代中国灾难深重的历史事实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充分发挥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文化遗址展示窗口作用。

保留历史记忆  
遗迹修复要“修旧如旧”

其实,不只是圆明园,漫漫历史长河,留下了众多承载着人类文明的文化遗产。岁月变迁,它们或被风雨侵蚀、或被人破坏,开展保护工作迫在眉睫。

对于文化遗产的修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柴晓明曾说,“修旧如旧”“最小干预”是文物保护的国际共识。“修旧如旧”就是指在修复之后最大程度地恢复文化遗产原初的状态,使其可以真实地展示历史原貌。

中国是“吴哥古迹保护国际行动”最早的参与者之一。吴哥古迹建筑大多由石块建造而成,由于年代久远,损毁或者丢失的石构件非常多。为了不改变文物原状,我国工作人员根据史料找到了上千年前吴哥古迹建造时的采石区域,发现了和文物本身材质相同的石头,修复过程中新增配的石材比例也严格控制在15%以内。

“修旧如旧”原则也被广泛用于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中。佛山祖庙、东华里历史街区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简氏别墅、文会里嫁娶屋等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岭南天地云集了22处文物保护单位,城市发展过程中,岭南天地采取修旧如旧的改造模式,让大量岭南特色建筑得以保留,整体街区也保留了传统风貌和历史记忆。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追古溯昔,人类将历史的记忆镶嵌于砖瓦之间。在文化遗产保护中做到“修旧如旧”,就是尊重文物本身以及它所连带的历史,代代传承、生生不息。

提升展示利用水平  
“开”遗址公园之“生面”

如何让丰富的文物资源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展览交流也是遗址公园面临的课题。展示并不是单纯地“摆”和“放”,而是需要把学术的东西通俗化、知识的东西趣味化、复杂的东西简化。为此,国内许多遗址公园都根据自身实际情况调整表现方法,通过不同形式把遗址的故事“说”给观众听。

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在这方面下了功夫。公园结合汉文化特色及自然景观规划推出了汉阙迎宾、海昏遗韵、暖壁礼天、灵湖夕照、金堤漫步、虬龙潜野、椰城怀古、西门望月、都城探幽和鄱湖观鸟十大景观,串联成园区文化游览路线;遗址公园内的海昏侯博物馆则利用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真实还原汉代社会风貌、生活习



2004年中国援助柬埔寨吴哥窟周萨神庙修复现场



新雷峰塔不仅复原原塔建筑风格,更像罩子一样保护着原始的塔基

俗等,让游客与文物零距离接触。位于杭州的良渚古城遗址也积极拥抱新技术。国庆假期,遗址公园引入AR导览眼镜,戴上这款眼镜对部分指定文物展品进行扫描,便可了解展品背后的故事。在观看刻鸟立高台符玉璧时,会看到里面的小乌活灵活现地从玉璧中飞出,这种体验让观众感受更为直观、深刻和有趣,不仅给游客提供了更丰富的信息,而且还拥有了更具吸引力的表现形式和叙事方式。

遗址公园是世界认知和了解中国的窗口,提升遗址公园的展示利用水平,不仅可以对遗址原貌进行直观呈现,让观众领略其拥有的历史文化、科学技术、艺术审美等基础价值,更能将深度的文化内涵阐释给观众看得清、听得懂的生动故事,向世界展现全面、真实的华夏文明。

## 交泰殿大自鸣钟传奇

翟翔 施雨岑 杰文津

洪亮的自鸣钟声准时从紫禁城交泰殿传出。钟声未落,紫禁城值房中的大清高官们纷纷掏出揣在补服中的西洋怀表,校准各自的时间。

早在18世纪前后就开始为紫禁城报时的大自鸣钟,今天仍安放在故宫交泰殿。

大自鸣钟所在的交泰殿,得名于“天地交而万物通”的古老东方智慧。“天地交”催动时间,浩浩荡荡奔涌不息,意味着进取创新;“万物通”突破空间,取长补短生机勃勃,意味着开放交流。

它的外壳是楼阁型木柜,高5.7米,黑漆描金。背面有一小梯,登上去可以给钟上弦。早在雍正年间,宫中就有按例维修养护这座大钟的规矩。

然而如此大名鼎鼎的宝物,来历却神秘模糊。

据清宫造办处档案,嘉庆二年(1797年)交泰殿发生火灾,大自鸣钟被毁。现存这座是嘉庆三年重新按原物重制的。那么问题来了,被烧毁前的大钟是何来历呢?对此各方说法不一。一种说法认为,这座大自鸣钟是由清宫造办处学习西方精密机械技术后仿造而成。另一种说法则更有戏剧性,认为这座大自鸣钟就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进献给明万历帝的那一座。

但无论是“国产仿制”或是“原装进口”,大钟的身世不能改变一个事实:它既是科学交流的先驱者又是时代兴替的见证人。而它在不同时代所经受的褒贬态度里,往往藏着历史风向的密码。

允文允武的清圣祖康熙帝,自幼钟爱世界先进科技,自鸣钟也是他的“心头好”。他曾御制《咏自鸣钟》诗:“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清晨勤政务,数问奏章迟。”诗里将自鸣钟这项来自西方的科技,用于监督自己勤政治国,从中不难看出,对康熙帝而言,大自鸣钟是他的“勤政钟”“强国钟”。

而到了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帝时期,对大自鸣钟的态度却有了微妙的变化。乾隆十年(1745年),大钟虽然仍保持了留置交泰殿的“待遇”,但却添了位新朋友——乾隆帝命造办处接近千



年前的唐朝技术制作了一尊古代水力计时设备——铜壶滴漏,也放在交泰殿内,与大钟相向而立。

一中一外两尊“时计”同殿而立,本来也算盛事,可乾隆帝命人刻在铜壶滴漏外壁的铭文中却有“较自鸣钟,淫巧徒传”这样对自鸣钟贬斥蔑视的语句。

乾隆帝闭塞自大的态度成为此后百余年里清王朝对世界先进科技、全球文明交流的官方态度。“玩艺”——此后直至鸦片战争,中国对西方科技的引进、使用与认知再未超过这两个字范畴。据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侵略军惊讶地发现,那些乾隆年间来华的外国使团配备的当时最先枪弹弹药与科学设备样品,连外包装都不曾拆开。

大自鸣钟仍在紫禁城里准点报时,满朝文武手里的表依然走着,精神的钟摆却早已停了。而此后百余年间,屈辱与苦难,都是一个民族为这停滞付出的代价。

大自鸣钟今天已不再计时用,而它所身处的这个国家也早已凭借创新与开放赢得了应有的尊严与安宁。这座传奇的大钟仍默默矗立,提醒人们:不闻“钟声”,炮声不远;交流开放,国泰民安。